

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沉浮录



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你们那里故事多。”陶铸又讲了 1962 年听到的广东人讲的故事。当火车向南开时，车轮敲击钢轨的隆隆声听起来像“前途、光明、前途、光明……”可是北去的火车，听起来就像“没希望了，没希望了……”

林彪是出名的“不打无把握之仗”，也出名的“敢于冒险”。他一生伴了“神鬼莫测”的定语。打仗神鬼莫测，“政治”神鬼莫测；面孔神鬼莫测，心灵神鬼莫测。“九大”是“神”，“十大”已经变成“鬼”……



4

权延赤文集

0086315

QUAN YAN CHI WEN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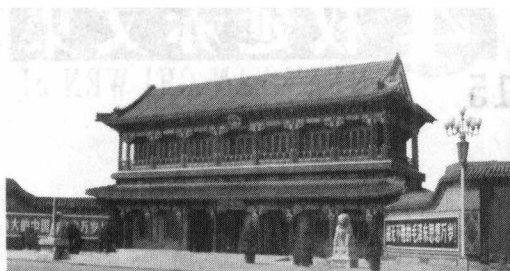
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沉浮录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uan yan chi wen ji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文集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印刷：北京皇家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77.5

字数：1400千

印数：2000套

2001年10月第一版 2005年12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204-04127-5/I·756

定价：100元（全十册）

目录

CONTENTS

党内的一头牛 5

■1942年，陶铸在延安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在食堂里吃饭时，与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吵了架。吵得很凶。这位高级领导干部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息事宁人地开导说：“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头牛；他有两只角，老要顶人。可是没有角，他就不是牛了。”

“一线”和“二线” 12

■毛泽东已是退居二线，即便是在一线，像此类具体部门负责的具体事情，也只能算小事一桩，也不该去报告毛泽东，去打扰他。

看来，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其中也含了对于退居二线、大权旁落的一种后悔……

山雨欲来 20

■陶铸又讲了1962年听到的广东人讲的故事。当火车向南开时，车轮敲击钢轨的隆隆声听起来像“前途、光明、前途、光明……”可是北去的火车，听起来就像“没希望了，没希望了”

渊源深长 26

■近代现代，湖南的革命者灿若群星；其中有两个“星座”，被称为湖南“革命的两大家”，就是毛家和夏家。

毛家为革命献出了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岸英等六位亲人，仅剩的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

夏家为革命也献出了夏明翰、夏明震、夏明衡、夏明瑜、夏明寄等六七位亲人……

来到北京 35

他的客厅现在已成了食客们的“雅座”，当年那里却是挂了“三洗堂”的匾。康生对来客，对那些党政高级干部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三洗堂，我自号三洗老人，每天要洗目、洗耳、洗心。”

一屁股坐下去 41

■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这次会议,多数与会者都是带了迷惑不安的心情。

特别是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他在汇报北京的形势时,那种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难看出,尽管他是以沉着镇定冷静而著称。

江青“交底” 49

■江青曾为自己作了一幅自画像: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在她“锁在云雾中”时,确实令很多人朦胧过。

成为第四号人物 57

■我对他的好感是在实际接触中渐渐增加的。尤其三年困难时期,粮库搞得粒米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他的观点的。现在他落了难,我又反过来骂他,那我还算什么人?

很不理解 63

■林彪是出名的“不打无把握之仗”,也出名的“敢于冒险”。

他一生伴了“神鬼莫测”的定语。打仗神鬼莫测,“政治”神鬼莫测;面孔神鬼莫测,心灵神鬼莫测。“九大”是“神”,“十大”已经变成“鬼”,并就此盖棺。

夫妻之间 70

■“这个陶铸!”毛泽东沉下脸,“你告诉他,曾志是我党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讲了正确意见他就要听,不听是要犯错误的,就说我讲的!”

之后,他又笑着对曾志深表同情地重复道:“还是那句话哟。善人受人欺,良马任人骑……”

江青大哭大叫 78

■江青不是一般的女人,但某些女人常见的毛病她哪样也不少,甚至表现更突出:不识大局、不识大体,只凭个人好恶来走极端。小肚鸡肠又鼠目寸光;肚里容不得人,眼里放不下事。

保刘邓,我是对的 86

■陶铸鼻子里哼一声,立刻回敬道:“我参加南昌起义,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当‘人之初’呢!”

斗争逐步升级 94

■中央文革是放火的,没有那些人“文化革命”就不能如火如荼;倘若光是他们,也不行。这场火就将烧毁一切,包括毛泽东前半生所创建的全部伟业。周恩来可以控制这场火,陶铸是协助周恩来工作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你要被动被动再被动” 101

■陶铸身体猛一耸,大声嚷道:“人家在那里还怎么能工作下去呢?身体又那样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得要帮人家一把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林总,今天主席保了我 109

■毛泽东微笑着冲他点头,大声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

陶铸眼圈立刻湿了。毛泽东一句话就等于把他保下来了。

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14

■张春桥、陈伯达和姚文元蓄力已久,几乎同时喊:“党内最大的保皇派就是你,陶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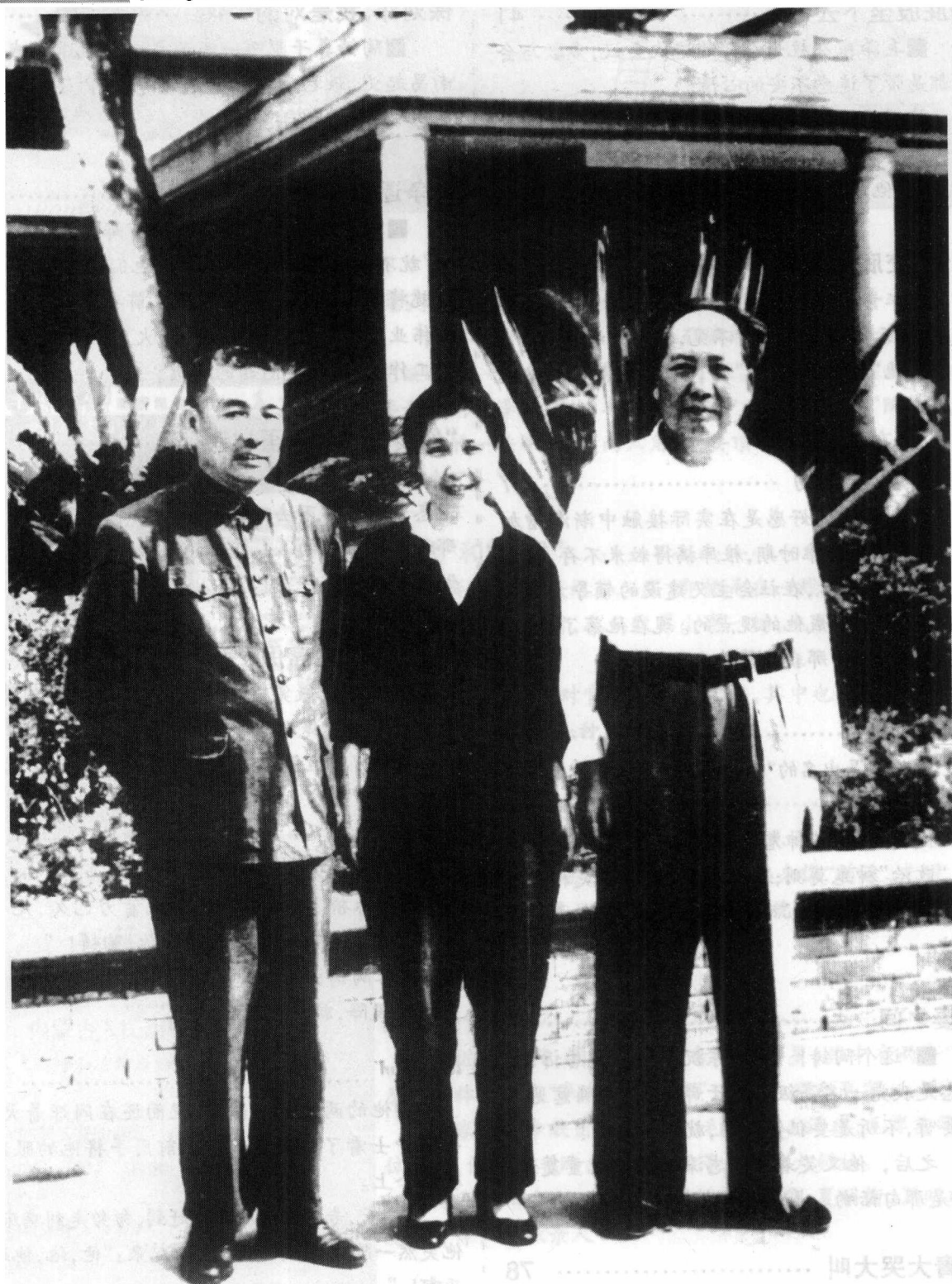
不容陶铸张口,江青突然举起拳头高呼:“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天哭” 122

■他的两眼依然圆睁,里面还在闪烁着火焰。一名护士看了心里发酸,上前用手将他的眼皮轻轻地合上。

第二天,专案人员从北京赶到,匆匆走到病床前。他突然一阵战栗,踉跄后退,叫起来:“他,他,他还没死啊!”

护士上前一看,不禁毛骨悚然:陶铸的眼睛又睁开了,里面仍然烧着火……





党内的一头牛

1964年12月26日。

北京的天气正由“冬至”转向“小寒”、“大寒”。

不过，在当时屈指可数的高级宾馆之一北京饭店里，依然温暖如春。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照镜面仔细刮净胡子。他的左手抓住腮帮用力一捋，丰满的腮肉蠕动着，在压力下紧缩，又在失去压力后鼓胀；他最后捏住了下颌肉轻摇几回。

很光滑，褪了皮似地光滑。

他本是有名的大胡子，建国后那大胡子的形象便被人渐渐淡忘，阔腮永远青幽幽地泛出光。他胖了，却决不臃肿，四方脸盘仍是有棱有角。他喜欢剃光头或是留平头，那是男性强悍武勇的象征。

现在许多青年时髦留长发，那是温柔安逸的象征。虽不能绝对这样说，但舒适安逸的生活越久，留长发的青年就会越多，花样名堂也越多，寻找男子汉也越困难。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往后看，让历史结论。

陶铸的手仍然停在下颌那里，不再摇。但是他已经心潮澎湃了。

熟悉陶铸的人都知道，他的手脖子上有一圈浓重的汗毛，生得兴旺发达；黑森森，亮闪闪。那是情绪的“温度计”。低沉时，那一圈毛便郁郁寡欢地倒伏着，一动不动贴了黄皮

肤发呆；一旦激昂，那黑毛便一丛丛一簇簇地膨胀着直立起来，震颤着似要飞扬。

现在，那圈汗毛便奋张着飞扬起来：

今天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今天是毛泽东邀请他去吃饭，去喝茅台酒！

他正值盛年——56岁。

他不断受到重用——当时尚未结束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他已经担负了不少重要职务的官身上，又增加了一个重要官职：国务院副总理。

然而，这不是终点，只是新的起点。他还要蒸蒸日上。在毛泽东所信任和赏识的人中间，他是佼佼者。

他在政治上，拥护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在私人感情上，他热爱毛泽东，感激毛泽东。这种感激是由于得到理解，受到爱护、保护，甚至是……袒护。

他有一副火爆爆的时常令人尴尬令人难以忍受的炮筒子脾气。这是不少老人的评价。

更多的战友说他是一团烈火，能烤热你，也能灼伤你。

妻子的形容很简单：“他是一副燃油似的性子，一点就着。”

外甥刘志修自小在陶铸家长大，他对舅父的形容大胆、真实、具体：“陶铸身材不高，一米六五左右，有时剃光头有时理小平头；貌不惊人气势逼人。他是A型血，胆汁质；脾气



爆,性烈如火。典型的农民出身的实干家;动作粗鲁,不拘小节,风风火火。他无论干什么都是大幅度动作,只要他一回来,你就听吧:开门,走路,脱衣,喝茶,拉动抽屉,一切都是轰轰响。连吐痰都能震动四壁!

“他为人刚正不阿,但不能算是政治家,太少城府,只能说是个实干家。所以常能看到他拍桌子的现象。拍桌子瞪眼,汗毛还支楞起来,要打架似的,很吓人。对同级、上级都有过这种情况。他不是那种有口皆碑的人,他是有争议的人。爱他的人爱得做梦都想,怕他的人怕得不敢见面,恼他的人恼得提起他名字就骂……其实这不同态度的人都是他的同志,而不是什么敌人。

“他生活上随便。艰苦朴素,不修边幅。经济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半斤肉,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一次,厨师周师傅为他做了辣子炒肉。他皱皱眉,吼了一嗓子,把厨师吼来了。他说:这个月我的肉已经吃到定量,这盘肉是怎么回事?厨师说:这是管理处送来的,照顾你最近闹病,身体虚……陶铸骂了一声难听的,抓起那盘肉就往痰盂倒。我们都叫起来:这太浪费了,哪怕送给工作人员吃呢?陶铸变脸变色说:是浪费了。可是不做这么绝,下次他们还会搞这鬼名堂!平时桌上洒一粒米,他都要用手抓起来往嘴里放。这次却硬是把一盘肉全倒进了痰盂。做得太绝了,从此再没人敢为他搞特殊。

“厨师受不了这个气,对我发牢骚:伺候你舅舅比伺候国民党将军还要难。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对舅舅传这个话。我本是想提醒他,他却发脾气拍了桌子:混账!把我跟国民党将军比!

“后来我才明白,他跟国民党斗争几十年,从八一南昌起义到广西剿匪,无数战友死在国民党枪口下;他又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了5年,受尽了酷刑,提起国民党当然是咬牙切齿,不共戴天。

“他把厨师叫来,光火地问:我只要点辣

椒青菜过日子,怎么就比国民党将军还难伺候?厨师也赌着一口气:问题就在这里,什么也不叫买不叫做,这还不是难伺候?陶铸大声说:炒一个辣椒难还是炒一个肉菜难?厨师索性讲了实话:我是跟你吃一样的饭呢,你不吃我能吃到吗?我还不如在大食堂干呢!

“陶铸怔了半天,猛地拍响桌子:你去大食堂吧,我另找不吃肉的来!就这样,他辞退了周师傅,另换了一位不打算沾光的余师傅来做饭。

“秘书,司机,警卫员也都说陶铸难‘伺候’。秘书说:他整个一个工作狂。没明没夜地干,谁能陪得起?关秘书说:那天下午一点,我熬不住,睡着了。他没批评我,醒来发现他还给我盖了东西。凭这一条,陪不起我也要陪。张秘书说:他犯了痔疮,还是没命地干,参加公园的义务劳动,回来一裤裆都是血。劝他休息,第二天他又去了公园。广州市每个公园都有他挑的土,栽的树。可有谁知道他每天流一裤裆血呢?回来还办公,屁股没法坐,就用汽车轮胎打上气,坐下去继续办公。这股子工作精神,再难‘伺候’我也愿意‘伺候’他……

“司机和警卫员说:‘伺候’陶铸真累,天天觉不够睡。他一年有三分之二时间在下面跑,就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连走在路上也不清闲,也要找事。

“有次下乡,走半路他叫车停下来,派人将县委书记和县长叫来,汇报公路建设情况。县领导滔滔不绝,又是数字又是实例。他总是摇头,说问题没汇报清。末了把他们一起拉上汽车,叫他们想,而汽车就在那30公里长的公路上没完没了的来回跑。陶铸问:‘想好了没有?’县委书记摇头。陶铸说,‘我用屁股都想出来!’又过了片刻,大概是琢磨出味道了。县长和书记说别开了骨头颠散架了。陶铸问他们想清楚没有?他们说想清楚了,他们的汇报有水分,表面化。至少这30公里的路段要翻修……



“陶铸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得罪人的实干家。”刘志修最后作一句结论。

曾经长期在陶铸领导之下工作的赵紫阳也有形容：陶铸像一辆坦克车，发动起来轰轰叫：他总是开拓前进，不注意也可能辗伤几个人。

解放之初，广西匪患严重。土匪番号有6个军政区，1个兵团18个军，74个师，31个纵队，其余旅、大队、支队、突击队等不计其数。新区求稳，政策偏宽，匪患剿而不清，我们部队和干部被杀6千余人，而十万大山和大瑶山的土匪已经十几个县连成一片，猖狂得很。而这时期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形势严峻。

1950年11月，中央发电，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命令陶铸去广西坐镇剿匪；限期半年，务清匪患。

陶铸一到广西便召开了三次高干会，会议结束便一直下到连队，下到剿匪第一线。

下连队那天，他叫司令部派个吉普车。说好8点，8点车未到。打电话联系，电话没人接。直等了一个小时车才到。

“混蛋！”陶铸暴跳如雷，“这样的部队能剿匪吗？剿个奶子！”

他以此整顿部队思想作风，仍然没有好听的话：“要辆吉普车，说好8点，8点走不了。松松垮垮，剿匪剿个奶子！”

他叫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写篇社论，说好三天完成。三天后，他去部长家看社论，部长说：“还没动笔呢。”

陶铸立刻翻了脸：“开会做了决定。为什么没写？你这样的人作领导怎么行？要误大事！”

他召开常委会，吼声如雷：“这种干部做工作是不得了的！没干劲，松松垮垮，怎么能



四位领袖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交谈

打仗？歼不了敌还要叫敌人吃掉！这种干部不能用！”

一道命令，把这位高级领导干部撤了职。

陶铸直接给毛泽东发电：广西剿匪落后，错误很多。对民枪不收缴，对土匪不杀，七擒七纵，镇压不狠，宽大无边……

毛泽东回电：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

陶铸下令：一股子匪是头，可不请示（处决）。广西不杀不清，越南通路不通。

最后一句话是指援助越南的铁路修通了也无法行通。那正是越南解放战争期间，每天中国要用500辆卡车从柳州至镇南关往返运输物资给胡志明。深谋远虑的莫文华将军一算账，500辆汽车运输一年的消耗，足够修通一条铁路。于是电请毛泽东，建议尽快修铁路。毛泽东3天后便回电“同意”。令铁道兵马上修建。

陶铸受命剿匪的期限是到1951年5月1日。



权延赤文集

Quan yan chi wen ji

铁路正式通车的期限也是 1951 年 5 月 1 日。

所以说“广西不杀不清，越南通路不通”。陶铸到大小瑶山 50 天，便灭匪 3.8 万人。他在十万大山灭匪 6.4 万余人，缴枪 9.6 万余枝。他不但参加了追剿，指挥，而且亲自审问土匪头子，亲笔批准杀头。半年时间，歼匪 45 万余人，杀头 4 万颗，按期完成剿匪任务。

陶铸挥动铁腕，给毛泽东写电文：广西歼匪 45 万，杀人 4 万，其中三分之一可杀可不杀……

毛泽东批：广西应该杀！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这无疑是唯一可取的正确办法。

广西清平了，陶铸旋即又赴广东。那是 1952 年 8 月。毛泽东当面对陶铸说：“全国三个乌龟，广东广西福建。现在那两个乌龟爬上去，还剩一个乌龟：广东。”

很显然，毛泽东是将陶铸作为开拓型干部来使用。

陶铸来到广东，毛泽东的电报也打来了。这正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电报说：剑英抓总，云逸主桂，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

这是对华南分局 5 位书记的分工。不久，陶铸又兼任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像陶铸这种“坦克车”式的开拓型干部，毛泽东心里当然明白，必是毁誉皆存。所以，他另有新意地评价说：“陶铸是党内的一头牛……”

为此，他对陶铸不但爱护，而且……袒护。

1932 年 4 月 20 日，毛泽东率领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当时，陶铸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正在农村广泛发动武装斗争。

陶铸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路经漳州，见到毛泽东、林彪、聂荣臻。陶铸向他们介绍闽东的政治、经济、民情、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情况，用他那与生俱来的大嗓门说：“闽

东是山区，土匪分散，敌人力量薄弱，农民斗争有一定的基础。我们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重点的重点又是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开展武装斗争。”

“好，对头。”毛泽东的嗓门一样高亢，“重点对头，重点的重点尤其对头。”

“我们已经建起了福安等县的游击区，其他罗源、连江、永泰、古田等县也搞起了武装、建立了若干梅花式的游击区。”陶铸稍稍一顿，说出来意，“现在主要是缺少枪枝。希望红一军团能支援我们地方两个连的枪枝，闽东根据地就可以早日建成。”

“两个连？”林彪声音不高，讲话慢条斯理，摇头的动作也是轻轻地，慢慢地，“不行啊，拿出这么多枪我们有困难。”

毛泽东眼睁睁看着陶铸变了脸色。第一次见面便看出这位中心市委书记是个沉不住气的血性青年。

果然，陶铸话音里带出火气和抱怨：“你们



李克农



0086315

光想着跟地方要钱要粮，就不想想怎么帮助地方建设根据地。我们要枪你们有困难，你们要钱要粮我们就没有困难？”

毛泽东用缓和的声音说：“我们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挺进的时候，共有4000多人，其中一半没有枪，只扛着长矛大刀。每人带一斤炒米，两次休息后就吃光了。如果不打仗就会饿死人。幸亏第三天晚上找到国民党的一支地方部队，打一仗，消灭了他们，夺到粮食。那天晚上大家饱餐了一顿……”

如果陶铸未卜先知毛泽东几年后会成为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他也许会收敛些。当时可不然，他叫起来：“那好吧，你们每人再背一斤炒米去找机会打仗吧！”

参加谈话的所有红军首长都愣住了，接着便有人光火地要发作。毛泽东及时摆摆手，压住阵说：“慢慢谈，部队和地方要多协商，互相支持……”

事后，林彪介绍说：“他是黄埔五期的，蒋介石骂五期的捣蛋分子最多。”

毛泽东笑了，不无欣赏地吐出三个字：“是头牛。”

牛长了犄角就要顶人。

但是，陶铸毕竟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重点的重点“又是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开展武装斗争”。这正是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和主张。

1937年10月，陶铸被分配到武汉，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上任便去找周恩来和董必武。

他穿一身咖啡色的广东装，走路又快，噤噤噤地上楼来。恰好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从房间里出来。李克农不认识陶铸，警惕性很高，见闯上来一个“不速之客”，忙拦上前：“哎哎，干什么的？”

陶铸当时刚出狱，急于投入工作，脚步不停，一边说：“陶铸！”

李克农也许没听清，也许根本不知道“陶铸”是什么意思，在他心中的知名人物里，还

不曾有过什么“陶铸”。他把身体一横：“不准上来！”

陶铸自尊心受了伤害，毕竟他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在福建搞过根据地建设，也搞过武装斗争，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坚持斗争5年，周恩来都知道他的大名，专门向国民党交涉，将他营救出狱，而李克农竟然根本不将他当人物！

“你官僚！”陶铸喊一声，身子便往楼上挤。

李克农一直是个管人的人，早在红军时期便是红一方面军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哪里见过如此大胆放肆的人？他性子又烈，闻声抡起巴掌，啪！结结实实打了陶铸一个大耳光。

陶铸猝不及防，脸上已是火辣辣，不由得大怒，一拳回击过去，打在李克农面上，眼镜也打落了。两个人立刻扭在一起，抡拳踢脚，顺楼梯滚下来，滚成一团。

骂声、吼声、扭打声，惊动了周恩来。匆匆跑出屋，见状大吃一惊，忙冲上去将两人往开扯。扯也扯不开，一向温和的周恩来竟也像火线上的指挥官一样吼起来：“住手！放肆！”

两个人各自给对方“最后一次打击”，然后才分开。

“你们干什么？啊，怎么回事？”周恩来严厉责问。

“这不知是个什么人，硬往上闯！”李克农脸色铁青，一边摸眼镜，一边喘粗气，一边指着陶铸咬牙切齿。

“他一上来就打我一个耳光，什么东西！”陶铸一样地咬牙喘粗气，“简直岂有此理！”

为此，周恩来专门召开了生活会，叫两个人做检讨。开始两个人谁也不肯承认错误，经周恩来批评教育，才各自做了自我批评。这时已是下半夜2点，认错可真够困难。

不打不相识，后来陶铸与李克农成了关系密切的好朋友。饭后茶余提起当年打架的事，李克农笑着说：“我跟毛主席讲：陶铸够大胆，敢跟我动手。主席说：跟我也吵过，这个人



是头牛。”

陶铸诙谐地一笑：“看来，我的举动若是不出格，你也还不认识我。”

1942年，陶铸在延安任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在食堂里吃饭时，与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吵了架。吵得很凶。这位高级领导干部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息事宁人地开导说：“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头牛；他有两只角，老要顶人。可是没有角，他就不是牛了。你想想对不对？”

这位高级领导干部想了想，只好点点头。

可是，毛泽东终于不得不找陶铸谈谈话了，因为告状的人不断，其中就有叶剑英。

1943年，陶铸调中央军委任秘书长兼政治部秘书长，后来又兼任政治宣传部长。他与总参谋长叶剑英发生了矛盾。

那时的军委秘书长不像现在的军委秘书长要负责全军日常工作中的大事，那时的秘书长只是在总参谋长以下，相当于现在办公厅主任的角色。

一次，陶铸找叶剑英，谈整顿王家坪八路军司令部的意见。叶剑英听了不高兴。

“运动不宜在部队里搞那么宽面，也不宜过深。”叶剑英一边措词，一边说，“我不赞成运动起来就到处加温。”

陶铸谈得也不大痛快，末了说：“这是王稼祥同志的意见，你斟酌办吧。”

王稼祥是领导红军长征的“三人核心”中的一个，当时在军委是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勉强说：“既然是王的意见，你们执行他的意见好了。”

这话里的含意，已是表明了不赞成甚至不介入。事情到此结束也好，但是几个月后，讨论一项军事训练计划时，陶铸直通通的讲话又伤害了叶剑英。

“你看看林彪同志写的这些，”陶铸带着钦佩喷响嘴，感慨地摇摇头，忽然又说一句，“你就写不出来。”

叶剑英红了脸，窝了火。他找了毛泽东，

把情况说一遍。

“叶参座，”毛泽东吸一口香烟，顿了顿，才吐出烟说，“陶铸这个人哪，我在漳州就讲过他是头牛。人是好人，就是长角，甚至混身长刺儿。如果刺儿少一点就更好了。”

“我跟他不好打交道。”

“这种牛，我们党还是需要的。”毛泽东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同他谈谈。”

毛泽东找陶铸来谈话，虽然是批评，语气里不乏出自内心的昵爱。

“你是怎么搞的？到处顶人。连少奇、伯达那样的同志你也顶。”毛泽东不提告状的人，只举众所周知的事例。陶铸“顶”刘少奇、陈伯达的事情是在党的会议上，以后还要具体写到。毛泽东只提这种尽人皆知的事，也是向同志负责的好方法，“你敢放炮，不隐瞒，不肯牺牲真我，这一条我们是相通的。可是同志相处，不能总是对人争吵，讨人厌，那样还怎么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人是有角的好还是圆滑的好？我看还是有角的好。但是不要到处顶人……”

以后，陶铸虽然注意了“刺儿要少一些”，但顶人的事还时有发生。他确是“党内的一头牛”；工作精神像牛，顶人也像牛。

以陶铸的这种“牛”劲，若是领导没有宰相肚量，他是一天也难混。更不要说被委以重任，并顺着职务的阶梯不断向上升了。

优点固然使人可敬，但是，缺点有时反而更能使人显得可爱。毛泽东是喜爱陶铸的。

陶铸容光焕发地走出盥洗室，秘书已经等在客厅。

“车准备好了吗？”陶铸大声问。

“备好了。”

“今天是主席的生日。”陶铸将放在桌上的手表拿起来看一眼，戴在手腕上。边向窗边走，边自语：“要好好辣一辣。”

陶铸饮食别无所好，就喜欢一个辣椒。三餐不能少。毛泽东更是喜欢吃辣椒，并有一句名言：能吃辣椒的革命性强。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当然，曾志与毛泽东的渊源更长更深，连陶铸也无法比。有那么一段时期，曾志可以像兄妹一样同毛泽东随便讲话，甚至赌气争吵，陶铸可从来不曾有这种历史。

可是，即便不那么激动，也不该这样若有所思地坐着不动啊。陶铸又看了一眼表。

“主席历来是不讲过生日的。”曾志终于讲话了，一边往起站，一边还是那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这一次却请了许多人吃饭……”

陶铸一怔，望着妻子不再做蠢声。

他竟没有想到这一层。

毛泽东都邀请了哪些人？陶铸还不知道。但肯定人数不少。至少各路“诸侯”是都受到了邀请。

各路诸侯是指各大区书记。

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便决定退出众人注目的中心，有条不紊地实行他退居二线的计划。然而，如果说不是从更早的时候开始，至少也是从1961年始，这个计划放慢了步子，甚至有所停止。现在，他已越来越多地重新回到决策的权力中心。换句话说，他曾表示不想唱主角了，很快就要退到配角地位。但是，如今他似乎改变了主意。

北京正在开着三个重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一向反对为党的领导人祝寿、过生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决定过生日，并且邀请了处于一线的身负重责、手握大权的各路诸侯去吃饭，当然不会是随意随兴的一般请客……

陶铸想思考，又似乎无从思考起。

到了餐桌旁再看吧。这是陶铸出发前的最后一念。

陶铸是很为自己的能吃辣椒和革命性强而自豪。每当中央领导人物在一道吃饭时，看到山西干部吃醋，江浙干部吃甜，而陶铸却与毛泽东一样大口小口吃辣椒，这时陶铸便感觉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亲一层。而且他们都不大能喝酒，而且他们喝过茶水都有吃掉剩茶叶的习惯。这时，陶铸不能不想到：“我与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饮食也是相通的。”

“辣椒使人激进。”陶铸曾带着自我解剖的神情，对他的独生女儿陶斯亮说，“亮亮，爸爸如果犯了错误，你们查吧，那肯定是左了。这辈子我是犯不了右的错误……”

“曾志，”陶铸叫他的妻子，“你怎么不动弹？该走了。”

陶铸一生最烦的事情便是同妻子女儿一道出门。他说：“女人最麻烦！”陶铸出门历来拔腿就走，可“女人”出门总要琐碎一番，不磨蹭几回就迈不动步。

曾志也受到了邀请，却不像平日出门那样早做准备，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坐在那里不动。



『二线』和『二线』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气色很好地坐在他的客厅里喝茶、吸烟。

沙发是俄式的，高、大、硬。毛泽东坐在这种沙发里，膝部成直角两脚就可以落地。但多数中央领导人坐这种沙发，常有悬腿之累。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直到去世前才发现。

他一般不留意琐事，特别是生活中的个人琐事。

他吸烟吸得多，但是很俭省。烟缸旁边放着烟嘴，当烟燃得不好拿时，便插入烟嘴。这

样可以尽量吸完一支烟，也可少熏一些手指。所以，那烟缸里的烟头往往不如烟灰多。

他喝茶喝得多，但是也俭省。因为茶叶全吃掉了。

他的身边放着书，随手就可以抓起来看，这是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习惯。但是现在他左手抓烟，右手抓茶杯，很久不曾碰那书本。烟雾始终在面前缭绕，偶尔露出两眼，那里目光淡漠。这是他思想问题时的惯有神情。

这种时候没有谁会发出声响。但也有例



外。一阵裤腿摩擦的极细微的响声传来,江青一直走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无动于衷。翻动纸张的声音近在耳边,他仍然不朝江青看。

“主席,座位安排好了。”江青将三张纸放在毛泽东面前的茶几上,“你过一下目吧。”

毛泽东眨一眨眼,似乎为他的思考画了一个顿号,拿起三张纸。他看得很仔细。

终于,他伸出右手。江青马上将一支铅笔递到他手中。

毛泽东抓笔作了最后一瞬沉吟,便用几个干脆果断的动作,交换了一对姓名。

于是,钱学森的名字移到了与毛泽东同一张的纸上,并且用粗线“塞”入陈永贵的名字下方。

毛泽东放了笔,并将那三张纸轻轻一推朝沙发靠去,低声说一句:“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

他没有提钱学森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二个月前,人民解放军的卡车在北京到处散发《人民日报》的号外。“号外”用红色大字印刷的标题宣布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比这更早的时候,当毛泽东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之后,周恩来已在接见大厅异常兴奋地宣布了这一消息。这颗原子弹又爆炸得如此是时候,恰恰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敲响了钟声。

人们不会忘记这样一幅照片:毛泽东与钱学森一起坐在试验基地的一张木桌旁。钱学森是美国加州工学院的一位科学家,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学而而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终于在1955年回到中国。就在这一年,毛泽东讲了“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经过了近十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终于有了原子弹。钱学森被普遍尊称为中国的核弹之父,成为毛泽东的坐上客。

但是,当毛泽东将钱学森的座位由对面

餐桌移到与自己同桌时,他没有提钱学森最大的贡献,而是讲这位核弹之父“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

他的兴趣已经不在原子弹上。同多数军事专家的看法不同,他对原子弹的政治考虑甚于军事考虑。所以他对外国记者说:“有几枚原子弹就足够了,六枚足够了。”他的兴趣已经转向钱学森在做出如此贡献之后,却“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亲自圈阅的一份文件,盛赞了钱学森和赵燕侠。赵燕侠作为著名京剧演员下连队与士兵共同生活之后,向北京市委和彭真同志提出:坚决要求取消保留工资,只拿一级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工资。

那时,一级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工资是300元,但是一些著名演员的保留工资往往高出基本工资2—3倍。北京市委的负责人曾问赵燕侠:“如果你取消了保留工资,而马连良等演员没有取消,你怎么想?”赵燕侠回答:“我没想别人,更没想同马连良他们比。我只想到自己与工农兵的差别太大……”

当时,有位农民问一位下乡的演员挣多少钱?演员考虑到差距,所以只说了一百元。没想到这位农民错以为演员是一年挣一百元。这位演员为这种差距感慨不已。

赵燕侠正是在这种比较中要求取消保留工资。

毛泽东认为,这是朝着最终消除资产阶级法权迈出的重要一步。

江青将毛泽东改动过的座位排列名单表拿回手中,虽然早已看清改动之处,仍然煞有介事地再看一遍。

她是在揣摩毛泽东的想法。

她从来不曾停止过揣摩。这种揣摩,往往需要掌握大量事实,将那些看似无关的事件、讲话综合起来分析,从中发现内在的联系,找出什么发展的规律。

尽管毛泽东限制她许多东西看不到,但她是有心人,可以设法打听,并且不放过蛛丝



权延赤文集

Quan yan chi wen ji

马迹。她是一个不甘寂寞,总想步入政界的充满权力欲的野心勃勃的女人。

那一刻,她一定想到了毛泽东近几年最经常攻击的靶子——官僚主义。

“你们有些人不让群众讲话,人们感到你们是老虎,老虎屁股摸不得。无论是谁有这种思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人民终究是会说话的。”这是毛泽东1962年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讲的。他目光灼人地望望左右,“你以为谁真的不敢摸像你这样的老虎屁股?不!他们会摸的!”

“一些官僚领导正在脱离基层,脱离人民!”毛泽东深锁双眉,声音愤激,“厂长不到工人中去;医生都待在城市里,不肯去边远农村去困难的地方;一些干部不按规定下乡劳动,下一趟就像野餐逛景一样!以后干部必须每年离开北京四个月,到人民群众那里去获得真知!”……

江青大约是要证实自己的某些想法,绕

山绕水地小声问:“李讷下乡了,没回来。李敏没下乡,是不是增加上她?”

毛泽东深深吸两口烟,齿缝间咝咝有声。他终于摇了一下头:“不要。”

“可是你的生日……”

“她不下乡?”

“她有病。”

“有病没资格!”

江青暂时闭嘴,似乎揣摸透了什么,并且证实了。但她仍然不走,她脑子一定转得很快。她不难想起另外一些事情和讲话。

一天,许多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位说:“不久前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曾引起很大震动。”

“我还是从你们嘴里才知道有这次展览。”毛泽东忽然显出气恼,目光灼灼地扫视出席会见的其他领导人,“看来我们的官僚作风越发严重了!”

毛泽东已是退居二线,即便是在一线,像



毛泽东接见科学家钱学森



此类具体部门负责的具体事情，并且只能算小事一桩，也不该去报告毛泽东，去打扰他。显然，毛泽东是借此发发心中早有的郁闷和不满。

什么不满？

对了，毛泽东曾恼火地说：“他们把我看做死去的祖先！”

看来，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其中也含了对于退居二线，大权旁落的一种后悔……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引起轩然大波。

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有勇气”，“他就敢碰斯大林”，“揭了盖子”，“虽然方法不好，但是搬掉了压在苏联人民头上的一块石头”。

另方面，毛泽东又认为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而中国也有人跟着这样转，这也是不对的。毛泽东说：“斯大林一生做了许多好事，当然也做了一些错事。”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为捍卫列宁主义，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做出了很大功绩。但是斯大林特别是在后期，没有把列宁关于发扬党内民主的一些好的设想继承下来，反而使个人崇拜越来越发展起来。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说：“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否认他好的东西也是不对的。如果说斯大林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说他六分好，四分坏，也不会通过。还是应该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说到这里，毛泽东幽然地笑了，不停地环顾他的战友们，“我们不能抹杀斯大林应有的功劳，否则他的灵魂还要找我们的。如果白天不来则晚上来，如果今天不来则明天来！”

毛泽东在1956年上半年讲这些话时，已经开始了对于改进无产阶级专政的深深思索。当大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变动发生时，总是要引起思想家新的思考。新的思考必然要产生出新的思想或主义。

几个月后，毛泽东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他的新思想，指出新的方向：他决定退出众人注目的中心，不再演主角，要退到配角地位。他提出了接班人的问题，要逐渐地有计划地将权力移交给刘少奇和其他战友，以便让这些资历很深的战友们独立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治形象。

毛泽东这一计划的关键是把政治局常委会分成“一线”和“二线”。毛泽东将退居到二线，分散职责和职务，这样就能使常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增加他们自己的经验及威信。这将确保毛泽东在死后，他的思想、路线、政策将由一些他所熟悉而信任的人所继承发扬，不再重演斯大林的接班人所发生的悲剧。

这个计划的准备工作立即便开始了。就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第三章第37条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毫无疑问，这个位置是为毛泽东准备的。

新党章中，为实行“一线”和“二线”的计划所作的另一改革是，设立了一个性质与原来不同的书记处。原来的书记处一直由毛泽东担任主席，成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这样的人选说明，这个书记处是最终决定着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组织及管理。

现在，以前书记处的职责将由政治局委员会承担，而新的书记处虽然也有很大权力，但其中只有总书记邓小平一人进入制定政策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也就是说，新的书记处成为独立于党的主席之外的机构，有助于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并使党的主席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中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以此来避免斯大林个人代替党组织的悲剧重演。



毛泽东实行他的退居“二线”计划的第三个表现是：他在“八大”仅仅致了一个开幕词，而由刘少奇做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

这表明，毛泽东正在把他的接班人推到前台。

“八大”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57年，他向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正式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我想到大学里去当一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对于接班人，他顺序讲了四个名字以及他们的优缺点。

他搬着指头：“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但是灵活性不够。第二是邓小平。这个人原则性强，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1959年2月，毛泽东迈出了退居二线的重大一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不担任国家主席。在提名新的国家主席人选时，邓小平打破沉默说：“都不提，我提。刘少奇。”

1959年4月，毛泽东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将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是通过正式选举完成了职责职务和权力的接替。同时，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也退到第二线，由刘少奇在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按照规定，党的代表大会五年举行一次。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1956年党的“八大”算起，过5年正是1961年召开第9次代表大会。从“八大”党章规定了一个党中央名誉主席的位置来看，合乎逻辑的第二步将是在1961年，毛泽东由党中央主席改任为党中央名誉主席。

然而，第9次代表大会没有如期召开。1961年不曾开，1962年不曾开……1964年就要结束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刘少奇将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可是，中国共产党第9次代表大会仍然没有开，甚至丝毫不见有这种打算或准备……

然而，在1964年有谁能揣摸透毛泽东那样的思想和计划呢？

显然，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思想和计划。

毛泽东续燃了一支香烟；他仍是吸得咄